

国学初阶

經學通論

李源澄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国学初阶

经学通论

李源澄 著 黄曙辉 编校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学通论 / 李源澄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11

(国学初阶)

ISBN 978-7-5617-7362-8

I. ①经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经学-研究 IV.

①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2719号

国学初阶 经学通论

撰 者 李源澄
编 校 者 黄曙辉
策划编辑 王 焰
责任编辑 陈庆生
装帧设计 劳 韧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杭州富阳永昌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32开
印 张 3.5
字 数 60千字
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
印 数 3000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7362-8/B·525
定 价 12.00元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出版弁言

李源澄先生，字浚清，又作俊卿，四川犍为人，一九〇九年生。祖父富春，清秀才，教授乡里。先生幼聪颖，从祖父学，少长，入荣县中学肄业，毕业后，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，从蒙文通问学，得侍讲席，甚为相得。一九二九年，蒙文通为函介先生至井研廖平家问学，得以及门廖氏，为其关门弟子焉。一九三三年，源澄先生出川东下，入南京支那内学院、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，从欧阳竟无先生及章太炎先生学。一九三六年，唐文治先生延先生任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，翌年，先生创办《论学》月刊，欧阳竟无、蒙文通、张森楷、邵瑞彭、伍非百、唐君毅诸先生之文均刊载其间。七月，抗日军兴乃止。是年返成都，任教于蜀华中学及四川大学，后去云南、贵州，任教于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及内迁遵义之浙江大学。一九四二年，回四川大学任教，两年后去南充，任教于西山书院。一九四五年春在灌县创办灵严书院。一九四七年去昆明，任教于云南大学及五华书院。一九四八年，应梁漱溟先生之邀，去重庆勉仁文学院执教并任教务长。一九四九年，兼重庆四川省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。一九五二年，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副教务长。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，翌年以肝癌不治逝世，享年五十岁。一九八一年，昭雪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
澄源之为学，实根柢于蒙文通，遇廖平而深邃，经章太炎而广大。张尔田称其学“如开封铁塔，不假辅翼，直上干霄”。邵瑞彭云：“李生年少，而其学如百尺之塔，仰之不见其际。”

其为名流所称誉如此。

《经学通论》之所为作，盖因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，故分“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”“论经文”“论经学流变”“论今古学”“论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”“论宋元明经学”“论清代经学”“论读易”“论读尚书”“论读诗”“论读三礼”“论读三传”十二篇，说明经学之性质与后来经学之途径，提出整理过去经学之方法，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。今据路明书店一九四四年铅印本整理，校正误字，收入《国学初阶》丛书。

自序

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，说经之书至于不可胜计。汉宋今古之争，纷如聚讼。近世以来，群相率以为畏途，而莫肯究。目录分类至不立经学一门，前人所称为经常不易之道者，今后仅存史料之价值耳。故吾作此书，其旨趣有三：一则说明经学之性质与后来经学之途径，二则提出整理过去经学之方法，三则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。学力薄弱，不克与所见相副，以此自愧。

李源澄序于成都国立四川大学 三十三 元旦

目 录

自序	1
一 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	1
二 论经文	9
三 论经学流变	21
四 论今古学	25
五 论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	33
六 论宋元明经学	43
七 论清代经学	47
八 论读易	53
九 论读尚书	61
十 论读诗	67
十一 论读三礼	71
十二 论读三传	77
附录：	
李源澄传(赖皋翔)	81
蜀学后劲——李源澄先生(蒙默)	85

一 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

孟子言：“经德不回。”又曰：“君子反经而已矣。”赵注：“经，常也。”刘熙《释名》曰：“经，径也。如径路无所不通，可常用也。”《周礼·天官·太宰》“以经邦国”郑注：“经，法也。王谓之礼经，常所乘以治天下也。邦国官府谓之礼法，常所守为法式也。”经学之经，以“常法”为正解，不必求“经”字之本义。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，而经之得名，则在于战国之世。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，而非经之达诂。近世释经义者皆释经字之义，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。经与经学有别，说详后。经学之名，初见于《汉书·兒宽传》，谓宽“见上，语经学”，盖经学即经义也。求之于古，若孔子之论《诗》《礼》，孔子之言《春秋》，皆善发经义者也。其统论诸经大义者，亦始于战国，《庄子·天下篇》曰：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《荀子·劝学篇》曰：“故《书》者，政事之纪也；《诗》者，中声之所止也；《礼》者，法之大分，群类之纲纪也。故学至乎《礼》而止矣。夫是之谓道德之极。《礼》之敬文也，《乐》之中和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《礼记·经解》曰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

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净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《史记·自叙》曰：“《易》著天地阴阳五行，故长于变；《礼》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纪山川、谿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其所自生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诗》以正言，义之用也；《礼》以明体，明者著见，故无训也；《书》以广听，知之术也；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盖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，而《易》为之原。”《白虎通》曰：“《乐》仁、《书》义、《礼》礼、《易》知、《诗》信。”此非汉人及汉以前人言经学之大端乎？故言经学，义当如是。

然吾人所谓经学者，汉代始有之学问也。何以明其然耶？吾国载籍分类，其最简者莫过于四部，以其内容大别之，则理与事而已。于事则史，于理则子，虽史之中未尝不言理，子之中未尝不记事，从其多者，则一言理、一纪事耳。集之起源，说者谓学不专家，谓集为子史之支流，可也。然所谓经者，果何物乎？前人于经史之辩者多矣，既不以为史，而又不以为子，谓经非史非子，可也；谓经非事非理，可乎？班《志》谓诸子皆经之支与流裔，使其言信矣，则经与子之关系亦密

也。若谓班氏之言不足信也，能谓宋明之理学亦不出于经乎？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则曰“考信于六艺”，本纪、世家所记三代之事，率皆本之于经传，谓经非古史，得乎？且近世古史之研究，实导源于晚清之今文学，廖季平师与南海康氏之言“托古改制”，本以解经学之纠纷，乃一变而为古史之探索。经与史之关系可知也。故近人目录分类，多不立经学之名，而依其性质分隶他目，此由于不知经学之为经学也。使不明经学之为经学，则经学也者，不与时俱逝而成为古代学术上之一名词欤。故言经学，于经学之性质，首宜识之矣。凡治一事，皆当明其性质与其范围，治经不当如是哉？乃治经者以顺释文字为究竟，凡一切故书皆然，经学独具之精神忽焉不察，可乎？夫经学者，史与子合流之学问，固非史学，亦非子学，而与子史皆有密切之关系，盖起于晚周而成于汉代。孟子之论《春秋》也曰：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。”《庄子·天下篇》曰：“其明而在数度者，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，其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。”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与旧法世传之史对言，以史与义对言，是在晚周经学已有与历史分离之势，但其时儒者著书，若孟、荀之伦，称引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其态度与《左》、《国》所记春秋时人称引《诗》、《书》无异。逮乎汉代，若伏生之《尚书大传》、董生之

《春秋繁露》者，论其内容与战国诸子无以异，而必纳其义于经术之中，儒者之义既托之于经术，儒术遂为经之附庸，而经学起焉。经学者，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，未有经学以前，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。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，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，吾国既有经学以后，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。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，圣君贤相经营天下，以经学为模范，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，故评论政治得失，衡量人物优劣，皆以经学为权衡，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，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，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，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，修正律令。在吾国人心目中，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，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万古长存，董生言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是也。经为明道之书，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，故吾以为以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。观于经学未成功以前，诸子皆可称经，《管子》有《经言》，《墨子》有《墨经》上下，《老子》有《邻氏经传》、《傅氏经说》，李悝有《法经》。及经学成立以后，则尊经而不敢僭，扬雄之《太玄》、孔衍之《尚书》、王通之“六经”，皆见斥于学者，其故可深长思也。自儒学托于经以成经学，于是经学与儒术不分。经学统一全国思想，故读书人皆名为儒，许氏《说文》以儒为术士之称，实据当时之见解为训，故经学为陶铸吾国二千年历史之学

问，吾国文化史之中心。孟子言“行之而不著焉，习也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”，吾人之于经学，诚若是也。今日学士大夫日云治经，而不能究其义，遂至目录家可以不立经学之名。若明于经学之意义，虽愚夫愚妇素不知书者，考其信仰与其言行，亦多在经学上有根据，经学可以分隶其他学术哉？经本是史文，但自经学成立以后，即变其性质。历史之于人生，言其意义，充其量不过知往察来、惩恶劝善而止耳，而经学则有为人生规律之意义。哲学者，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而已，而经学虽非宗教，而有宗教之尊严。故吾谓经学非史学，非子学，而为子史合流之学问，为一特殊之学问，自具独立之精神，而非史与子所能包含。欲知经学对吾国影响之大，当自历史中求之，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，始能见经学之意义。

经学之性质既在子史之间，而非子史甚明。虽经与经说皆为史料，此自史学言之耳。若自经学言经学，则经学自具有其特性，而所谓经学者，惟汉儒之通经致用、宋明儒之义理之学足以当之。汉儒之学偏于政治，在吾先儒则以为外王之学；宋儒之学偏于内心修养，在吾先儒则以为内圣之学。以今日术语言之，则一为社会科学，一为哲学。然吾皆谓之为经学者，以其必皆在经学上求根据也。而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与其影响之大，亦正在此。此于吾国政治上之统一

关系甚大，不难一思即得，无待繁言。欲经学永存于中国，则当继续此精神而发扬光大之，不然，经学仅为史学之资料耳。然此亦非易事也。汉代去古未远，又未有外来之影响，其变不巨，故汉儒可以服古入官，通经致用；宋代佛学输入已久，教义已大明于时，故宋儒得出入二氏，反而求之六经，以中兴儒学。今西人学术之来中国方且萌芽，吾人于固有学术有重新认识之必要，安敢望汉宋儒者之事乎？然此固经学将来之正路也。惟其如此，然后可以推陈出新，继续前人文化。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则有三事：一曰治经，二曰治经说，三曰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。治经者，治理经之本文，首当与古史明其畛域，经文虽为古史之资料，然经学脱离古史而成为经学，自汉迄今二千余年矣，经学者，汉以来之学术，故经学之研究，宜以汉为断限。如清人辨伪《尚书》，以汉人所见而不疑者为真，而不追求于周秦以上，此非特以别于古史之研究，亦经学之本分然也。治经之道，一曰释文，二曰释义。释文有释文之工具，释义有释义之工具。治经者以文字始，以义理终。昔人考据义理之争，皆不达于理者之言，一曲自蔽之见也。治经又当以经为律令，以经证经，合于经者为是，不合于经者为非，于其无明文者则阙疑。汉宋今古门户之争，存而不论可也。治经说者，治理先儒说经之书也，先儒说经之书虽为经而作，

其学术思想亦见焉，前贤治经，于此皆少致力。若陈奂之于《毛氏诗》，张惠言之于虞氏《易》，刘逢禄之于《公羊》何氏学，皮锡瑞之于伏生《尚书》之学，皆所谓专家之学也。惜其眼光尚狭，与吾所谓治经说之意不尽同。吾所谓治经说者，于其说经之文予以疏通证明，于其学术思想亦予以发挥介绍，并与他家较量，以明其学术史上之地位。如王弼之《周易注》、《论语释疑》，不仅为说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之书，亦魏晋玄学之要籍，此在学者善用之耳。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者，以吾国自汉以来之历史皆以经学为中心也。经学对吾国政治、社会、人心、风俗关系之大，人皆知之，而无人能剖析具陈者，此非治经学历史者一大事乎？当知治经学历史非一钞诸史《儒林传》便可了事者也。经为吾国古代文化之总汇，谓古代一切与经有关可也。二千余年之历史，其主要学术为经学，谓二千年来之文化与经有关可也。如此浩漫，治经者何所致力耶？曰：此在吾人视其才性之所宜，与其工具之所适，尽力为之而已。学问之事，有纲领焉，有条目焉。一学有一学之纲领条目，一书有一书之纲领条目，得其纲领，条目虽不备，无伤也，势不能也。如治一书，先明其全书之条例，此即一书之纲领也，其余一篇之不知，一义之不明，一事之不识，乃条目之不备耳。荀卿论学必明其统类者，此也。吾见前人有号为

专治一经者，果能通全经而无一不明乎？盖其内容既杂，而为学之工具与才性类各有所偏，故不能免于斯累耳。苟不识此，而曰我无不能，则荀子所谓“愚者自以为知之，无知也”，岂不哀哉。

二 论经文

孔子以私门授徒为儒学之祖，学者承业，传授不绝。虽秦焚书禁学，汉初诸大师犹抱遗经以教于民间，田何之《易》，伏生之《书》，高堂生之《礼》，与乎三家之《诗》，《春秋》之有公、穀，皆是也。汉人皆谓六艺出于孔子，故史迁著之于其书，自汉以来，学者无异言，所争特在述作之间而已。近人始有谓孔子不修六经之说，吾则以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者，周人之旧传，而赖儒者传之，《春秋》者，孔子所修，以其义口授弟子，其后为公、穀二家之传。《易》为卜筮之书，不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同科，《十翼》之作，当在孔子之后，《易》之成为儒者之业，当又在《十翼》既成之后。然经学乃汉代之学问，自有经学，吾国人思想始一纳之于经学之下，此为春秋战国所必无之事。秦人一统，学者或有经学之运动，卒成焚坑之祸，以为是古非今者戒。以至汉武之世，始告成功焉。经学虽成功于汉代，经之名则战国已有之，故荀子言“诵经”，庄子言“六经”“十二经”，盖以自上所传来者为经，而以后起者为传，故司马谈言“六艺经传以千万数”，经传之名，秦汉之际必已流行也。蒙师文通于《经学抉原·传记篇》已尝论之，今可勿论。惟宋以来所谓十三经者，《孟子》为儒家，《论语》亦宜在儒家之列，《公羊》、《穀

梁》、《孝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尔雅》皆在传记之列，汉传虽不以《左氏》为解经之书，亦多诵习之，独《周官》所传周制与诸经多异，自后人言之，皆为经学，自汉人视之，宜其不以《周官》、《左氏》二书为经也。汉初经学皆在民间，文帝始立《诗》博士，翟酺所谓“一经博士”者也。然武帝以前之博士，如唐之翰林，所以处一切方术之士，当时博士之性质，当于今所谓专家，本不为教官。赵岐谓文帝立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于学官，或由当时此四者皆置博士，故尔云然，学官则本无有也。汉人言经皆指“五经”，故刘歆谓“《诗》始萌芽”，翟酺谓“置一经博士”，皆不及此也。自汉武立五经博士，置弟子员，于是博士始为教官。汉代用人之法，自武帝而立，凡有三途：一曰学校，二曰选举，三曰征辟。取人既不使异端杂进，学校为教化之原，以经学为之倡，宜乎一道同风，自此以后，不复有大违经旨之思想起于其间也。自经学深入于人心之后，则又不赖乎学校，北魏以来学校，多以处贵胄之士，何与于经学之隆污乎？学官所立，考试所用，惟关于注家之盛衰，乃经学范围以内之事，若唐之《五经正义》，明之《四书五经大全》是也。自汉以来所谓经者，虽有五经、七经、九经、十三经之殊，自经义言之，皆不出乎五常日用之道，以经文言之，文字间有讹脱，篇章间有遗亡，不能复汉人之旧，然大体固无殊也。